



轻工业出版社

苏绣

孙佩兰 编

轻工业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苏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本书首先介绍苏绣秀丽工整的图案，柔和淡雅的风韵，变化多样的针法，精工细腻的技艺。它与湘绣(湖南)、蜀绣(四川)、粤绣(广东)并誉为中国的四大名绣。

其次介绍苏绣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发展的概况。还介绍了刺绣出土文物的验证。本书可供从事刺绣工艺、研究刺绣艺术的爱好者阅读。

苏 绣

孙佩兰 编

*
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路3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1/32 印张：1¹⁶/32 字数：31千字

1982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700 定价：0.21元

统一书号：15042·1704

前　　言

苏绣是我国著名的手工艺品之一。它以秀丽工整的图案，柔和淡雅的风韵，变化多样的针法，精工细腻的技艺驰名中外。它与湘绣(湖南)、蜀绣(四川)、粤绣(广东)并誉为中国的四大名绣。

苏绣是以苏州、吴县一带为其主要产区的刺绣品。在苏州地区，无论是市区或四乡农村，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刺绣艺人们用五彩缤纷的丝线在绫缎轻纱上精心绣制着一幅幅图案精妙的绣件。其中有娇艳欲滴的“月季”，活泼可爱的“小猫”，绚丽开屏的“孔雀”以至名山大川，园林小景，古今人物，历史图景以及美化生活的龙凤被面，月季枕套，绣花服装等等。千百年来，艺人们在这枚小小的绣花针上倾注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心血，用自己的巧手培育了这株民间艺术之花。但在旧社会，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占有它，用作享乐却极少有人关心它。她们的精湛技艺得不到历史记载。这本小册子试图“集腋成裘”，把滴点文献以及传世和出土文物等方面一鳞半爪的材料搜集起来编写成册。但限于水平，“挂一漏万”和“窥井之谈”在所难免，我们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广大读者协助充实、补正，使这技艺苑奇葩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化人民的生活并传之千古。

目 录

一、刺绣的起源.....	(1)
二、宋、元时期的苏绣.....	(4)
三、明代的苏绣与顾绣.....	(10)
四、清代的苏绣日用品与欣赏品.....	(16)
五、清末杰出的刺绣艺术家——沈寿.....	(24)
六、乱针绣与杨守玉.....	(29)
七、苏绣艺术的衰落.....	(32)
八、古艺新花.....	(33)
九、绣针传友谊 彩线寄深情.....	(37)
十、永恒的怀念 难忘的绣像.....	(39)
结束语.....	(41)

图录

一、苏州虎丘塔出土刺绣经袱残片.....	(42)
二、“白孔雀”散套绣.....	(43)
三、“拙政园”乱针绣.....	(44)
四、“小 猫”双面绣.....	(44)

一、刺绣的起源

刺绣是一门民间工艺品。在我们祖国各地，从东南沿海到长城内外，从西北边疆到锦绣江南，各族人民都喜欢用刺绣美化自己的生活，装饰周围的环境。这朵美丽的工艺之花起源于何时呢？据传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各个部落是以不同的图腾纹样来作为部落标记的。有人头龙身的，也有牛头人身的等等。开始，有的人将自己部落的图腾纹样细刻在自己身上，叫做纹身。后来随着麻布，毛织品，丝织物的出现，人们有了衣服，因而就开始在衣服上刺绣着图腾的纹样，就这样，刺绣就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这个传说与史书记载是吻合的。据《尚书》记载，四千多年的章服制服，就有“衣画而裳绣”的规定，也就是说上衣上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雉的异名）图案是绘画的，而下裳的宗彝（长尾猴尊）、藻、火粉、米、黼黻图案是用绣的（这十二章图案一直沿用到明、清）。《周礼·考工记》上也有“绘画之事，五彩备，谓之绣”的说法。

1976年，陕西省宝鸡市发掘的西周前期殉葬墓中发现有辫子股针法的刺绣印痕，花纹主要是运用单线条（一条辫子股）勾勒轮廓，只有个别部分为加强纹饰效果，运用双线条。线条舒卷自如，针脚相当均匀、齐正，说明刺绣技巧是很熟练的。在文献上，周代也有“绣绘共职”的记载。总之，周代已有针法单一的辫绣是无疑的了。

1958年，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用辫子股绣，有龙凤图案的绣品，是近期见到的最早刺绣实物。《史记》上有“楚庄王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的记载。

到了汉代，刺绣应用就更广泛了。1972年，在长沙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刺绣衣物四十件。这批绣品不仅数量大，花色品种也较为丰富，有丝棉袍、香囊、竽律袋、兀巾、夹袱、手套、镜衣、枕巾等。但刺绣的针法仅辫绣与铺绒绣两种。其中以辫绣为主，铺绒绣仅见于内棺的四壁板与盖板上，绣在褐色缣地上，以直针施以黑、棕红、棕黄等色线，平铺满绣。图案严谨，色彩和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平绣作品。以辫针法刺绣的图案，大都以穗状流云、卷枝花草、如意状花纹和茱萸花等为主体的纹样。在这些图案的流云中还连缀着姿态各异的鸟兽纹。这些纹样讲究对称与连续进行。花纹生动，线条流畅，除马王堆外，在河北怀安五鹿充墓，新疆民丰，甘肃武威等地都曾发现过汉绣。汉代刺绣品的针法，以辫绣针法为主，也有少量的平绣针法（马王堆出土的铺绒绣）以及接针出现。从西周到两汉出土的实物来分析，刺绣针法是以辫绣针法开始的。这是由于这种针法的线条组织简单，刺绣者容易掌握，只要针脚均匀，弧度一致，毋须讲究晕色效果。再则，运用这种针法刺绣的图案，结实耐磨，适合绣日用刺绣品。两汉时期，辫绣法不仅普遍，而且运用得相当娴熟。如马王堆出土的刺绣品中，用辫绣针法绣的作品不仅针脚均匀，弧度一致，按图案线条进行盘旋，紧密整齐。在技法处理上亦比较别致，例如，挑形鸟的头部用菱形图案作眼眶，空地，正中用单针辫子股绣，以表示眼珠，这种处理方法给人以简明、清晰的感觉。单针辫子股粗一看与以后出现的打籽针法有相仿的效果，但它的针线运动仍是辫子股针法。再如绣卷叶，从圆头到尖端处，从最粗处六条辫绣并列到尖端成一线条，由粗至细，循序而进，在尖端处用较长的针脚钉一针，使花纹的尖端更细。由于绣者能

够根据纹样，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虽运用同一的辫绣针法而不显得呆板。

汉代刺绣在文献中看到的应用范围就更加广泛了。班固《西都赋》“昭阳特盛，隆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囊以藻绣，络以纶连”。由此可以看出，不但衣服用刺绣来装饰，皇宫里的墙壁，也挂满了华丽的刺绣品。当时，不但皇宫如此，大地主，大商人的住宅也是一样。贾谊政事疏：“白毅之表，薄纨之裹，徒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宾客者以被墙”。可见，刺绣品的应用范围日渐扩大了。

刺绣在汉代已开始专业生产。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说明绣工与锦工有了更明确的分工。汉代刺绣与织锦齐名，常常是“锦”“绣”并称。两汉时襄邑的织锦与齐郡的刺绣都是有名的。故王充又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

从上面出土的汉绣与有关刺绣的记载来看，两汉时期绣品不仅已广泛运用，而且分布地区亦比较广，有新疆、甘肃、内蒙、河北等地，也有长江以南的地区。

苏州地处大江之南，太湖之滨，气候温和宜植蚕桑，丝织生产和刺绣工艺亦早已闻名于世。苏州民间传说：古代有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在结婚前夜赶做一件新嫁衣，一不小心在襟上剪了一个洞，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用一根彩线在襟上绣了一朵小花，这样不但掩盖了破洞，而且由于绣的花朵色泽鲜丽，穿在身上格外漂亮，从此，苏州人都喜欢穿绣花衣服了。这个故事当然是无可稽考的。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吴国与中原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织锦与刺绣工艺相继

传入吴国，吴俗逐渐由远古的“断发纹身”进而为“披锦被绣”，这是十分自然的发展。据史载：公元前549年，吴公子季札聘郑（今河南一带），曾送给郑相子产数匹吴国出产的白经赤纬的丝织品。又据《说苑》记载：“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从上述记载来看，吴国在当时不但已有作为国家礼品的高级丝织产品，而且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刺绣礼服了。由此可以想见，春秋时期吴人已广泛地运用刺绣工艺来美化人们的生活了。

三国时，吴国赵夫人亲手绣制作战用的山川地阵图。据《王嘉拾遗记》载：“孙权常叹，魏蜀未平，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形军阵之象”。赵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于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称为“针绝”。这幅山川地阵图，有人认为是“画绣”的开始。赵夫人当是“画绣”的始祖。但当时的刺绣技艺可能还不及北方，故《颜子推家训》中载：“河北妇人，织纴组𬘓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南”。这指的是六朝。上述南方刺绣技艺不如北方的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隋唐，从晚唐起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以后，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州地区的刺绣技艺亦日渐发展提高了。

二、宋、元时期的苏绣

在苏州著名的风景区虎丘山上，矗立着一座宋初建成的古塔——虎丘塔，雄伟庄严，古朴庄重。1956年，人民政府在修葺古塔的过程中，在塔的第二层中发现了相当丰富的文

物。其中有四块破残的刺绣经袱（据经志记载，经袱是舍经人包经卷用，这几块经袱都是与经卷一起出土的，是苏绣最早的实物）。都是以罗为地，刺绣花卉图案，针法虽不甚细致，却古朴大方，部分色彩犹可辨认。有一块已泛焦黄色，上用毛笔写上“丘山寺塔上”字样；一块作深栗壳色，上绣金黄莲花；一块紫地绣莲花，菱花；一块深紫色上亦是绣菱花、莲花。针法有铺针、接针、施毛针、平抢等。上述几块刺绣除花卉外，还有一个残存的“捨”字是刺绣的。据考证，虎丘塔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末（公元959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公元961年），可知，该塔出土的经袱是五代到北宋前期的文物。1978年，在苏州盘门内的瑞光塔第三层塔心的窖穴内，发现一批北宋文物中亦有刺绣经袱。罗地，绣图案形花草。它的配色和谐，针法有斜缠、接针两种。用绒作绣线，针迹不甚工整，但绣面平，并系两面针，正反面均无线头，线结（采用记针的方法代替打结），在两叶交接处有跳针，所以只能称作两面针而不能称双面绣。虎丘塔与瑞光塔出土的刺绣经袱，在技法上已掌握多种针法的运用，三色线晕色的方法，具有较高的水平。宋代，在日用刺绣技法熟练的基础上，加之绘画艺术的影响，苏州已出现了作观赏用的刺绣欣赏品。《应庵和尚话语录》中有“平江吉彬二侄女绣普贤像”的记载。明代苏州人张应文著《清秘藏》中载有“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只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采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具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嚙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明吴人文震亨著的《长物志》。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到宋代苏绣欣赏品多以名人书画为绣稿，题材广泛，有山水、人物、花鸟等。在刺绣技法具有精工细

致，形象真实、生动，设色精妙，光采夺目的特点。从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中的两幅宋代刺绣欣赏品“海棠双鸟”“《梅竹鹦鹉》来看，绣稿系南宋的院体画，具有工整写实之风。如《梅竹鹦鹉》，梅花、竹叶两枝，一只红嘴翠羽的鹦鹉亭立枝间，极绰约美丽之态，犹如一幅绘制精工的宋人画，绣工精细，晕色和顺，运用平套、抢针、擞和针、缠针、滚针、扎针等多种针法刺绣。其中主要是平套针，擞和针。套针绣始于唐代，据记载“唐绣大士像，绣得妙相天然，它的布色施采用线有之四层叠起”，大约是用套针刺绣的。宋代刺绣品中运用套针，擞和针就更广泛了。这两种针法一直延续到明清以致近代都是苏州欣赏品中的主要针法。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几幅宋绣是我们目前能见到比较早的刺绣欣赏品，亦可说是早期的“画绣”。

关于沈阳故宫馆藏的几幅宋绣，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宋绣，另一说是明绣。理由是（1）这几幅刺绣原系刺绣收藏家朱启钤先生家藏的，在年代问题上，朱老先生可能有意识地提前了。（2）从出土的刺绣实物来看，似乎与这几幅刺绣品的技艺水平相差比较远，从而怀疑宋代是否有可能出现这样精美的《画绣》。关于这个问题，编者同意前一种观点，即把《梅竹鹦鹉》《海棠双鸟》列为宋绣。依据是（一）在朱启钤先生前，清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安仪周（号麓村），曾收藏过这两幅刺绣，不仅在绣面上有安仪周家藏的朱文印，而且在他所著的《墨缘汇观》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宋绣海棠双鸟，方幅，高八寸二分，阔七寸七分，绣西府海棠一枝，二鸟，一鸟飞来，一立枝上，织工明密，高出绫面”。据载，安仪周精鉴赏，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他的鉴别，基本上是可信的。（3）从出土实物来看。到目前为止，南方出土的宋绣

有苏州虎丘塔，瑞光塔发现的北宋前期的刺绣经袱（针法有抢针、接针、铺针、缠针、施毛针。）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前期的双面绣团鸾经袱（斜缠针）。江苏金坛县周瑀墓出土的南宋贴绣褡裢（针法有缠针、扣绣、钉线、贴绣。）福州市郊黄升墓出土的刺绣花边，荷包。（针法有辫绣、齐针、抢针、接针、打籽、结子、钉金、施毛针、铺针、贴绣等十一种针法）。北方出土的有山西出土的北宋双鸟包袱（缠针），南宋的罗绣抹胸（接针，辫绣），北京双塔出土的刺绣龙袱。从上述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宋代，南方的刺绣品不仅品种多，针法丰富，而且针法运用相当娴熟，还有双面绣的绣品，在刺绣技巧已比北方高出一筹，有这样娴熟、精巧的刺绣技能，加上绘画的影响，某些既能掌握刺绣针法技巧又懂画理，或善画的刺绣者，将刺绣与绘画结合而产生《画绣》完全是有可能的。苏州自三国、东晋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之乡，到南宋时，都城在临安（杭州）画院人才济济，对苏州也有影响，当时苏州刺绣日益发展，已趋于成熟阶段。所以，我认为，上述的两幅花鸟绣可能是南宋时期苏州地区的作品。这类《画绣》作品的出现，是刺绣技艺发展中的一个飞跃。

苏绣远在宋代就能得到如此繁荣的局面，是有其一定客观原因的。宋代统治阶级对外怯弱，对人民群众却尽压迫和剥削之能事。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奢侈糜烂，对于精美刺绣品的需要有增无减。他们在苏州专设绣局，大肆搜刮。特别是宋高宗南渡杭州，偏安一隅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工艺美术的生产自然也就相应地南迁并得到发展。苏杭相近，苏州也就成为统治阶级搜刮贡品的重点地区了。同时，苏州交通便利，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和商贾来往于苏州者甚多，他们对刺绣的需要量增大，而且

对艺术质量要求也高。这些情况客观上促进了苏绣的发展。苏州地处太湖之滨，气候温和，适宜养蚕植桑，丝织工业也很发达。锦绫绸缎，花色繁多，当时有些奇异的花纹还为巴蜀织工所效法。宫廷开始在这里设置“应奉局”，专门督办绫锦等御用之物。据《图经续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苏州岁输帛（各类丝织品）达八万匹之巨。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勃罗曾到过苏州，看到苏州“机房遍城，夫络妻织”的盛况，他称誉苏州是中国的“丝绸之乡”。他在《行记》中写道“苏州是一颇为名贵的大城——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它织物”。宋代与绫、锦等丝织品生产日益发展的同时，刺绣，缂丝，绣线等工艺亦随之发展。单以刺绣用的丝线而论，当时已出现了一条作坊集中的“绣线巷”（见《宋平江城坊考》原址是现在的修仙巷）。此外，苏州是官僚地主阶级告老还乡养老的城市，也是书画名人集中的地区，对刺绣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据《考工记》里说：工艺美术生产的发展，要具备“天（气候）、地（环境）、材（原材料）、工（技术）”四种条件。宋代的苏绣正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才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与提高，使它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元代，由于蒙古统治阶级的压迫与摧残，苏州的经济、文化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在工艺美术生产方面，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元世祖曾三次拘略江南民匠达四十万户，置于燕京与其他城镇，设“织染局”等机构进行奴役性强制劳动，对苏州工艺美术生产有破坏作用，影响了技艺的提高。故《清秘藏》中说：“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燕闲清赏箋中亦云：“元人之绣，便不及宋，以其用绒粗肥，落针不密。且人物花鸟，用墨描眉目，不若宋人以绒绣眉，瞻眺生动”。这可能是指一般欣赏品而

言，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南京博物院藏元代女画家管仲姬（赵孟俯妻）绣的“观音像”运用接针、斜缠针、擞和针、鸡毛针绣，绣的观音像面颊丰满，静穆生动，具有工整、健壮之风。继承了宋绣的风格。

元末，在张士诚（1356年～1367年）统治苏州期间，对劳动者开放人身自由，鼓励了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对刺绣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64年，苏州市文管会在南郊吴王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发掘刺绣品四件：罗底，是衣裙的残边，绣品图案均系四龙，相向而行，两龙之间有云纹，构图平衡，形象生动。刺绣的针法有接针、缠针、施毛鳞针、铺针、扎针、正抢、反抢、平套、打籽九种。其中运用得比较成熟的是施毛鳞针，不仅排针紧密，整齐，而且丝理转折自然，就是缠针，平套针，正抢针运用得不够娴熟，但仅在一种图案中运用多种针法，是难能可贵的。张士诚是一度割据苏州的吴王，她母亲墓葬中出土的刺绣品，可代表元代的苏绣。元代统治阶级曾掳掠江南民间工匠到北方，进行强制性劳动，固然对苏州的刺绣生产是有破坏作用的。但另一方面，工匠北迁，对苏绣技艺传播，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1976年11月在元集宁故城（1192～1312年）出土的窖藏丝织物中有一件绣花夹衫，衫上有九十九个花型大小不同的花纹图案。其中有仙鹤、凤凰、野兔、双鲤、鹭鸶等动物；亦有牡丹、幽兰、灵芝、百合、竹叶等花草；还有人物故事画像等。刺绣针法有打子针、切针、辫针、抢针、鱼鳞针等。据分析，这件绣花衫在刺绣手法上具有现在苏绣的特点，在造型设计上富有江南风味，诸如湖光景色，鹭鸶等飞禽，幽兰、竹叶等草木，都不是北方地区的景物。这类刺绣很可能是北方地区官匠局中苏州工匠刺绣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苏州刺绣的技

艺水平。

三、明代的苏绣与顾绣

明代建国以后，摆脱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与压迫。朱家王朝鉴于元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在建国初期采取了奖励垦荒等一系列措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起了积极作用。但在苏州，由于朱元璋迁怒苏州百姓帮助张士诚守城抗明，所以在田赋、徭役等方面比别的地方加重。苏州府内有90%以上的土地收为官田。在工匠制度方面，继承了元代的一些做法，如在苏州继续设立织染局，手工艺人都另编户籍，以应付徭役等等。所以明初苏州地区生产发展不快。到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在施政方面开始放宽。当时巡抚周忱，知府况钟都比较关心苏州人民的疾苦，首先在苏州地区推行了新税法，使原来被田赋负担压得透不过气的贫苦农民，有可能以副业的收入，填补钱粮的不足，促进了农村副业的发展。近郊如唯亭、陆墓、横塘、木渎、蠡墅，都逐步发展为手工业集镇。丝织业更有了较大的发展。苏州城内，东北半城户户纺织，质量、花样都超过了宋代，如织锦，据《姑苏志》记载“今吴中所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花样，五色炫耀，工巧殊胜于古”。官营的织染局下还设有绣作，染坊等工场。明中叶以后，由于广大农村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作为农村副业的刺绣生产，亦得到了发展，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苏州地区素有“家家养蚕，户户刺绣”之誉。

明代，在官办刺绣作坊内，绣工们专为朝廷绣制车舆服饰。朝廷还规定了官服所绣花纹，帝王贵胄，龙凤绕身，公候，驸马绣麒麟，文武官吏的刺绣图案，各有定官。据洪武

廿三年定制，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鸿鵠，杂职，练鹊。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些图案都是绣在服装补上的。（补子是钉绣在官服前胸后背正中的，以不同图案代表官衔的标志）即使同是一品官的补子，都以仙鹤为主题，但姿态以及背景配搭可以各不相同的，所以服装补子不仅图案花色多，而且在刺绣针法亦是多种多样的。如1978年，苏州虎丘山的一座明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块服装补子。图案是孔雀牡丹（按规定，这是一位三品官的服装补子）。绣面上一对孔雀相对作飞舞状，四周有牡丹，云纹，水浪等作装饰。运用铺绒、叠抢、扣绣、擞和针、盘金、钉线、斜缠和打子等八种针法，刺绣技巧娴熟，比元代出土的绣品大有进步。明代的苏绣在原料和针法上已与山东的鲁绣，北京的洒线绣不同而形成了精细雅洁的地方风格，受到人们的珍爱。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名字叫来复者（字阳伯，三原人，进士）在扬州做官，他在诗文、书画之外对琴棋、剑器、百工技艺无不通晓，唯独不会“女红”。因此，后来他特地到苏州来学刺绣。象来复这样的达官贵人尚且专门来苏州学习刺绣，说明了苏绣在当时已有非常高的声誉。

明代，对苏绣影响较大的是上海露香园顾绣。顾绣在技艺上继承宋代苏绣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而且作为商品盛行于江南一带。所以长期以来，苏、沪两地经营苏绣的商店都以顾绣或顾绣庄冠名。这样，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把苏绣与顾绣混为一谈。为了说明这两类刺绣的区别与联系，下面专门谈一谈苏绣与顾绣的类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一) 历史简况的对照

苏绣是以苏州、吴县一带为刺绣品生产的中心区。它的产品分日用品与欣赏品两种。从前面简述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苏绣起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开始是绣服饰等日用品的，后来在日用刺绣技法熟练的基础上，加之受绘画艺术的影响，宋代出现了专作欣赏用的“画绣”，自此，苏绣工艺基本上是沿着日用品、欣赏品这两大品类向前并行发展的。明代苏绣在原料、针法上与山东、北京等地不同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顾绣出现前，王鳌（明正德年间的户部尚书）主编的《姑苏志》中就有“精、细、雅、洁、称苏州绣”的评价。

顾绣，据《顾绣考》记载“今天下称刺绣为顾绣者，以明代上海顾氏刺绣之名，震溢海内故也。上海顾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6年）进士顾名世而始著称。名世曾筑园于今九亩地露香园路，穿池得一石，有赵文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园（露香园路即纪念此名园也）故世称其家刺绣为‘露香园顾绣’或‘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为‘露香园绣’由此可见顾绣起源于明嘉靖年间；是上海顾氏家族之绣，扩大之亦只是顾氏作坊之绣。

顾绣自缪氏始至名世次孙媳韩希孟（夫顾寿潜，字旅仙，别号绣佛主人。能书善画，师董其昌）。这一阶段的作品大都为家庭女红，只是为了家藏或馈赠亲友，并不是为了出售而制作的（缪氏绣见记载而无实物可考，韩希孟绣传世的有沈阳故宫博物馆藏册页八幅。上海博物馆藏册页四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册页八幅）。自名世死后，顾氏家道中落，乃不得不倚赖女眷的刺绣以维持生计，于是顾绣从家庭女红向商品绣过渡。在初期，仍不失闺绣精工细致的特色。据崇祯